

## 新世紀台灣現代小說中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以胡淑雯、黃麗群、徐譽誠的代表作為例

黃文倩

新世紀(21世紀)以來,台灣社會在全球經濟萎縮、兩岸經貿重新盤整下,社會流動空間大幅縮小,薪資水平持續負成長,失業率高居不下<sup>1</sup>,看似「民主」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體制,也並未能為台灣人民帶來有效且康健的向上發展,社會動盪不安,老無所終、幼難成長、中壯輩頹敗虛無。不少作家敏銳地意識到這樣的困局,自覺或不自覺地,似乎開始節制「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以「被侮辱與被損害的」<sup>2</sup>---弱勢者、邊緣人、底層為書寫對象及思考範疇。胡淑雯(1970-)的〈浮血貓〉(收入作者2006年的代表作《哀艷是童年》)、黃麗群(1979-)的〈入夢者〉(曾獲2005年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徐譽誠(1977-)的〈與情愛無關〉(曾獲2008年第30屆聯合文學獎小說首獎),是台灣近十年來,具有這樣一定左翼視野的代表作。

然而,不同於中國大陸新世紀以來,由李雲雷等批評家和創作者,有自覺地發展與建構「底層」理論與書寫的實踐<sup>3</sup>,胡淑雯、黃麗群、徐譽誠等作家,雖然有這方面的嘗試,其作品也屢屢受到台灣文化圈的關注或得到重要的文學

<sup>1</sup> 陳博志〈近十三年台灣經濟福利之比較〉之整理與指出:「依主計處的資料,我國實質國民所得,在1999至2007年間平均成長率2.56%,2007至2012年則僅有1.17%。……扣除物價上漲因素之後,2012年每人平均國民所得的實質購買力只有2007年的98.3%,即下降近1.7%。……2007年台灣政府總負債僅增加237億元,2012年卻增加達2,476億元,2008至2012年間政府負債更增加達1兆8千155億元,平均每人負債增加7.8萬元。……1999年製造業受僱員工平均每月薪資37,738元,2007年增加到43,169元。……而這期間物價卻上漲逾7%,故實質薪資下降約4.9%。……25~29歲年齡層之失業率在民進黨執政8年為5.687%,2007年為5.87%,已經很不好,國民黨再執政5年這年齡層的平均失業率更衝到7.498%。……每人平均儲蓄由2007年之61,473元降為2012年之60,647元,降幅達1.3%,再扣掉物價上漲,2012年全國每人實質儲蓄比2007年降低約7.9%。窮人已多根本無法儲蓄。民進黨執政前所得最低五分之一家戶平均儲蓄仍有2萬元左右,民進黨執政8年,最低所得家戶之儲蓄降為平均每年僅58.4元,已很淒慘,國民黨執政5年更降為平均每年負儲蓄22,445元,窮人實在已很難生活。」完整分析參見:<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3/8133>。

<sup>2</sup>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典出杜斯妥耶夫斯基原名小說。

<sup>3</sup> 參見李雲雷《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及《重申"新文學"的理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獎項，然而，嚴格來說，這類佳作仍然只是他們作品中的「靈光一現」，優點是由於沒有批評界與理論界的干預或影響，鮮少產生問題小說的概念先行的弊病，讀者因此也得以較自然地、形象化地被觸動，或多或少打破我們每天可能聽說、遭遇，甚至也身在其中卻早已麻木的靈魂，因而見識到新世紀以來，台灣社會的一些新的關鍵困境的橫切面與主體困境。因此，本文想分析這些較具有「進步性」的面向與視野，並且初步評述它們的限制跟台灣社會、思潮與文化間的生產關係。

一

從主人公及題材的性質來說，胡淑雯〈浮血貓〉寫的是底層老兵，黃麗群〈入夢者〉寫的是長像平庸、甚至醜陋的青年男性，徐譽誠〈與情愛無關〉發掘的則是蝸居在都會下層、擔任基層工商小職員、總是覺得自己很胖需要減肥的年輕女孩，綜合來說，就是：老、醜、胖、青等相對弱勢者的困局，雖然他們已無溫飽問題，但在新世紀以降的台灣現代社會裡，這些人民如何安頓與發展他們的人生？跟台灣社會與現代性發展呈現出什麼樣的相互生產關係？

胡淑雯的〈浮血貓〉是她的名篇，不少研究者曾作過一些評述，基本上時常將它視為一種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書寫。它的情節以對比、反襯的方式推進，寫一個國民黨時代的外省老兵，和一個雜貨店小女孩殊殊兩個階段的互動故事——殊殊 6 歲時曾被這個老兵性騷擾，但對當時的殊殊而言，她並不覺得有什麼道德羞恥，一切只是孩子的一場純真的冒險。然而，當年身邊的「大人」們，卻因為自身的各種或道德或陰暗的動機，覺得殊殊一定深受傷害，因此以私刑暴打、教訓了這個老人。長大後的殊殊對此一直心懷歉意，在一次同坐公車中，她再度認出了當年的老人，「選擇」跟蹤他回到下層貧民窟般的家，佯稱自己是社工人員，在老人的「要求」下，替他洗澡，甚至手淫，而老人也在這樣的「安慰」後，重新有了活著的感覺，感覺到：「霧中有鳥雀在叫，有蝴蝶的翅膀閃過，……感覺自己的太陽穴底下，有血管跟著心臟在跳。」老人甚至開始上市場買新的衣服，也一併買了一個廉價的髮夾，打算送給那個「社工」女孩，每天痴痴地期望她再來看他，因為一次的被關愛與被手淫，他似乎開始有了新的生活希望。

過去已有評論者注意到，這篇作品在女性主義上的激進性，建立在與宗教的聯繫上，例如楊慶祥曾細緻地分析過殊殊對老人的手淫行為的救贖價值：「在這裡，『施』與『受』、『罪』與『罰』構成了宗教的隱喻，暗示了最後的拯

救似乎必然在教義的指導下才能完成。」<sup>4</sup>換句話說，殊殊之所以能為老人作出「安慰」的行為，其動機與胸懷早已超出一般世俗的兩性關係或道德意識，是以一種接近宗教的高度，在安慰著這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

然而，我同時想要補充的是，儘管胡淑雯確實有著自覺的女性主義立場，並且成功地讓曾為弱者的小女孩長大，更以激進的進步思想，超越並克服了童年的創傷經驗，生產出一種不同於世俗道德的主體性----能坦率平視老人的卑、賤、髒，以及能獨立擔當、自主付出的現代女性主體。但〈浮血貓〉還有一些隱微的歷史心理、副支線或副角色的揣摩與刻劃也不容忽視，我認為需要將這些副線、其它的主人公的意義也補充進來，才能看出胡淑雯〈浮血貓〉更敏感的社會分析才能和藝術再現能力。

支線之一是老人的歷史背景與複雜的心理刻劃，和敘事者不時穿插的評述。老人是典型晚年在台仍孤身一人的老兵，六十多歲的時候曾居住在所謂的博愛院，再更老一些，則是隱居在平民住宅後方的鐵皮寮，用作者的形象化的表述是：「恍若一處處傷口，曝曬在人間」<sup>5</sup>。他的工作是專收送葬隊伍的喪家花束，並以轉賣它們維生，喜歡本省人的葬禮，覺得它們吵吵鬧鬧就像有好多子孫，這種寫法烘托老人的孤獨，又不因帶有普世意義上的疼惜而抽象。他年輕時自然經歷過戰爭與沙場，目睹過同伴的死亡，聽過許多哀號直到斷氣的聲音，以前就覺得自己救不了別人，現在則更為衰敗。很明顯地，這是一個曾經信仰過、跟隨著國民黨一生，最後無論在物質和精神上都一無所有的人。作為一個文學家，胡淑雯沒有以功過高低論英雄，而是以另一種公正的敘事者聲音為他辯護：「他連自己都不知被丟到哪去了，哪還能救得了誰呢？」<sup>6</sup>因此，在小說中，這個老兵要賴的個性便有其現實和藝術上的合理性，甚至可以說仍有生動的力量，包括年輕時以一些小手段性騷擾殊殊，多年以後面對「社工」的殊殊，仍賴皮地裝手痛「要求」殊殊替他手淫----人生實難，他的不道德其實並不太嚴重，相對於大歷史的殘酷，作者顯然有這種參照式的理解，所以才沒有以世俗的抽象道德與邏輯來譴責老人的猥瑣，同時，儘管他有其無賴，但也不該被完全剝奪活著的權力與求生的願望。

<sup>4</sup> 楊慶祥〈「辯證的抵抗」----由胡淑雯兼及一種美學反思〉，收入《橋》，2014年12月冬季號，台北：人間出版社，頁99。

<sup>5</sup> 胡淑雯〈浮血貓〉，收入胡淑雯《哀艱是童年》，(台北：INK 印刻文學出版)，2006年，頁105。

<sup>6</sup> 同上註，頁107。

支線之二是殊殊的母親，小說中沒有交待殊殊的父親是誰，去了那裡，只交待這個母親開著一家雜貨店，忙碌到沒有空教導小孩。長大後的殊殊，有一天聽母親跟她談起一個男人，說這個男人年輕時曾經跟她借過錢卻去跑船，現在竟然寫了一封信給她，說想還錢。小說以女兒殊殊的心理揣摩著她的母親，揣想著不時抽著煙、被生活磨損到現實世故的母親，也曾經將積蓄純潔地奉獻給愛情，甚至多年後再收到信，仍能召喚回愛情的感覺。在這裡，可以充份看出作者對底層人民渴望愛，及對愛情意義的認同---無論它是否能有回報。

支線之三是當年暴打老人最兇的一個配角，這個人是當年殊殊家的鄰居，一個大學新聞系畢業生，曾是街區裡學歷最高的一位，但卻屢屢考不上廣播電台，他被拒絕的理由很簡單，僅僅是因為台灣國語很嚴重，很明顯的，在台灣本土意識與文化領導權還未興起的時代，這是一種嚴重的缺陷，這個人因而長期被埋沒，長年在發展有限的庸俗生活裡，漸漸地產生出了一種憤世嫉俗的酷吏人格。作者將他的命運跟暴打老人聯繫在一起，清醒地呈現弱勢者欺凌另一個更弱勢者的奴隸道德心理。

支線之四是小說中同住在鐵皮寮旁邊的另一個六、七十歲的男子，這個男子似乎是個瘋子，時常在咒罵路人，罵累了就唱台語或日語歌(由這個細節可以判斷應為本省人)，而且盡是童謠。他的工作也是拾荒，但在看似裝瘋賣傻中，他仍對女人很感興趣，總是期待著某個女人經過他面前，總是想送女人一些他撿拾來的東西，就像原始的獵人求偶一般坦率自然。小說最後甚至寫到他們不知從那裡撿來一台報廢的唱盤，不認命地修好，唱盤中不斷傳來一個女人唱著時光不再、時光不在的女聲……。那應該是一首極溫柔的老歌，在被台灣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社會、歷史甚至時間放逐的貧民窟裡，似乎點染著一種人間弱勢者相濡以沫的愛情與溫情。

小說最後的結尾，是似乎已然恢復生命希望的老人，拿著打算送給「社工」女孩的髮夾，一心期望地等待她再來。她會不會再來呢？小說沒再交待，一切只收在老人把這個髮夾夾在自己頭髮的姿態上，而且忽然聽到原來仍然只有自己一個人在喃喃自語的聲音……。

總的來說，胡淑雯〈浮血貓〉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的視野，遠遠不僅僅只是核心的老人與性別意識的主題，作者企圖關懷的對象實有著進步的多元性。然而，此作似乎更多地想建構，在這樣的貧困的環境下，以溫情、愛欲為人生命重要的救贖或出口，但最終，這樣的愛也只能是靈光一現，因缺乏長遠現實上的合理性與條件，僅能讓以愛為救贖封閉在個人的期待與想像中。

二

無獨有偶，黃麗群〈入夢者〉寫一個長像平庸、也就是現代世俗意義上的年輕醜男的生活困境，但它在藝術上的特色，是將這樣的困境，跟新世紀已蔚為主流的網路世界聯繫在一起。由於長像太「抱歉」，主人公性格非常畏縮，除了在速食店打工的時間外，總是蝸居在電腦網路的世界裡，甚至發展出一種人格分裂的行為----在網路的世界中，給自己申請了另一個女性的帳號，以這個帳號寫信給自己，同時自己再回信給「她」，每天不斷往復這樣的行為，甚至在虛擬的世界裡，幻想著跟「她」的諸多共同點----共同親密的分食，甚至纏捲的做愛，不斷地自我幻化延續著自己跟「她」在網路世界的交往。然而，現實中的他仍是個醜男，在長期三更半夜使用電腦下，白天的工作品質也受到影響，甚至最後被速食店的幹部開除，只能改去便利商店打工，而他終究也驀然驚醒，但卻不是後悔，而是更加犬儒，覺得一切也沒什麼，繼續過著百無聊賴、毫無希望的生活。

這可以視為一種台灣新世紀底層生活的「簡單」代表作。非以內涵的深刻而以「簡單」和「真」取勝，尤其，它誠實且敏銳地碰觸到美醜也是一種社會階級與權力的問題，醜是一種弱勢者的困境，在現代大眾文化的審美趣味(例如細瘦、有型、酷帥)下更形不堪，所以，隔了一層可以虛擬的網路世界，反而能成就一種假性的救贖。這種主題跟契訶夫當年的〈吻〉有點類似----長像平庸的軍官，自覺到外貌的平庸，他因此無法開展合理的兩性關係，只能活在幻想的世界裡想像一種溫存，而當他最終發現一切只是他的幻想，契訶夫選擇的是讓這個軍官生氣----仍有力氣也仍要對生活表達不滿，即使他根本不可能改變他的外貌與現實。

然而，黃麗群〈入夢者〉的寫法和意識傾向，最值得注意的恰恰是她賦予這個角色的認份與妥協。她簡明的刻劃男主人公如何自我說服這種對醜的認份。

從知識上，他從國中的生物課的孟德爾種豆的遺傳學聯想起，自覺到自己在怎麼樣的家族客觀的劣勢與條件下生長，既然無從改變，也只能接受。他顯然位處下層，所以這篇小說沒有發展為讓主人公以整型的方式，改變他的命運，他採用傳統鄉土台灣社會的認份觀----「就像父母給孩子命名為阿狗阿牛，

以免鬼使神差養不大」<sup>7</sup>，以自輕自賤面對他的人生，所以他活得非常低調，認為這樣才能避開禍害。

這種源於台灣鄉土社會安頓人心的認份觀，當然並沒有辦法在已然步入現代的現實社會上終極地解決主人公的生活與心理困境，所以，在新世紀高度的網路發展下，他有了新的幻想空間，他的幻想對象也是平凡的、合理的，甚至幻想久了，活在網路世界久了，他開始連其它夢境也沒有----生命不斷在自我幻化的過程中愈來愈窄。但「我」真的能夠一直自我幻化下去嗎？

小說最後有個奇特的情節，「我」寫信給「我」幻化為女方的「她」，約「她」出來見面看電影，但「她」回信給我時，只回了一半，一切乍然停止。這個懸念或懸置的處理甚佳，像生活中偶爾會出現的意外，也並非是重要的謎，「我」就成功地讓「我」順利地從自己的幻化中脫身，賣掉電腦，回復牛狗般的日常生活。小說最後收在某種自然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傾向的書寫裡：

他有时早晨醒來，尤其是在催汗的暑熱，躺在床上聞見自己終夜不散的體臭，回味著夢中那具宛如奶酪的女體時，他總不可抑制自己去揣測：那晚凌晨三點四十七分「她」來不急寫完的那封信裡，到底原本要跟他說些什麼東西？<sup>8</sup>

但在這樣對「她」的渴慕下，「我」仍很快地恢復了現實：

……長嘆口濁氣後從床上起身，換穿上跟昨天一樣的T恤與短褲，準備到便利商店接班然後拿店裡報廢的麵包牛奶當早餐。……完全忘記今天是自己三十二歲的生日，只是又開始了一個美夢永不成真的日子。<sup>9</sup>

和胡淑雯一樣，黃麗群也是極敏感又聰明的作家，作為一個活在現代工商資本主義社會、行走江湖的女性，她們看待人物的生命困境都有一定的社會視野，並不會以完全天真的姿態來毀滅主體，然而，黃麗群也跟胡淑雯一樣，在台灣戰後長期沒有左翼文學淵源的視野下，儘管意識到弱勢者的困境，但不認為社會、或身為作者的人，有辦法與責任去面對甚至解決它們，因此〈入夢者〉

---

<sup>7</sup> 黃麗群〈入夢者〉，收入黃麗群《海邊的房間》，(台北：聯合文學出版)，2012年，頁55。

<sup>8</sup> 黃麗群〈入夢者〉，收入黃麗群《海邊的房間》，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12年，頁66。

<sup>9</sup> 同上註，頁66-67。

最後的收尾方式，成全的不免只是一種過於冷靜且平庸的洞察，在這一點上，作者跟她這篇的主人公一樣「廢」<sup>10</sup>與認份。

### 三

當然，每一種社會的新的困境，都有其歷史或前因，作家也身在當中，無從避免，我們也不該過於苛責，畢竟作品從廣泛的意義上，並非僅僅是作家個人的創作，而仍是一種新的社會生產的結果。劉亮雅在討論解嚴後台灣小說中的一些矛盾時，就曾以後現代和後殖民為兩大座標，作出重要的困境生產的概括，劉說：

後現代與後殖民都強調去中心，但後現代注重表層、感官、反本質、去中心、去歷史深度、解構主體性，強調身分流動及多元、異質、文化雜燴、(台北)都會中心，而後殖民則朝向抵殖民、本土化、重構國家和族群身份、建立主體性、挖掘歷史深度、殖民擬仿，以及殖民與被殖民、都會與邊緣之間的含混、交涉、挪用、翻譯。後現代的反本質、去中心有助於抵殖民，卻又不支持本土化、重構國家和族群身份；後現代的文化雜燴與後殖民的擬仿、含混看似雷同卻不然，因後者仍具歷史深度。由於台灣內部的需求，解嚴以來兩者之一都並未形成主導，而是兩者的並置、角力與鑲嵌構成了臺灣主導文化及文學的內在精神，質疑國民黨戒嚴時期大論述。<sup>11</sup>

新世紀以來的徐譽誠的〈與情愛無關〉，仍可以看到這種後現代與後殖民思潮與意識型態延續、交雜、矛盾的體現。

〈與情愛無關〉從命名來說，既是小說中人物狀態的實質，也是一種反諷，因為整篇作品雖然仍從情愛甚至愛欲出發，但是主人公們的關係早已貌合神離，相依與身體交融也無法救贖彼此的孤獨和意義。小說主要處理一個跟男朋友同居在城市下層、從事基層會計工作的女孩的生活和生命意義的發展困境。它的題材的特色處，乃是將對情愛的需求與饋乏，與現代性中以瘦為美的審美觀，及對女性的壓迫聯繫在一起，女主人公因此總是覺得自己很胖、總是想減肥，

<sup>10</sup> 柯裕棻曾以「淡淡廢廢的美」為喻，比附黃麗群及其小說的特質。參見柯裕棻〈淡淡廢廢的美〉，收入黃麗群《海邊的房間》，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12年，頁12-20。

<sup>11</sup>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解嚴以來的台灣小說〉，收入陳建忠、應鳳凰等合著《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出版)，2007年，頁350。

身體常處在飢餓的邊緣，這種肉身恆常得不到飽食的空虛，跟她的情愛的空虛同屬一個隱性的感覺結構。

從情節來分析，女主人公和她的同居男友都各自在外有另其它的情人，但兩人都基於某些難以理性言明的原因----或許是現實中的習慣、道義與不願傷害對方，雙方都不點破也不願正視已經無愛的同居關係。但女主人公顯然是更為不滿且痛苦的，她意識到自己和同居人的被動與維持現狀，其實也是一種軟弱，她理解、甚至厭惡這種軟弱，因此儘管她在性上向外發展，首先是基於對同居人的報復----因為對方先出軌，但更關鍵的意義，是她覺得至少在這樣的性愛裡，驗證了她能自主「選擇」，用作者的話來說是：「為了用原始的赤裸身軀證明，證明自己不是弱者，證明若自己想要，也能輕易做到。」<sup>12</sup>，然而，這種看似存在主義的意志決絕，仍無法給她帶來真正意義上的身體和精神安頓，她仍然相信且需要基於情愛的性，而非只是性本身，是以，在小說中，作者不斷讓女主人公一直後設地反省----無論是她自己、同居男友、她外面新的情人，都有其各自的虛偽，而或許由於年紀與靈魂仍然年輕，她對這種虛偽與不真深感困擾與痛苦。

因此，徐譽誠這篇作品的進步性及複雜的推進是在於，比起胡淑雯及黃麗群的前作，他並沒有將新世紀以降的這些新型的現代性下的弱勢者的困境，繼續以情愛/愛欲來作為解決或中和的手段，而是將女主人公，甚至各主人公的困境，自覺地放至台灣新世紀以降的「民主」運動與選舉文化下來理解，換句話說，當連主人公也意識到，她/他的困境「與情愛無關」，而根本就是台灣社會問題的縮影的時候，這篇小說中的情感與意識均達到更高的張力。

這種進步性的處理方式，在小說中是以現代性的影像媒介的鏡射來開顯：時間應該是 2008 年，某個選舉過後，因為疑似的手段不公，電視新聞都在討論群眾暴動的可能，情節來到女主人公約會完回到蝸居的住處，她看到同居男友也裝沒事的吃著泡麵，隨意批評「輸贏早知道了，有啥好暴動？」<sup>13</sup>女主人公無言地聽著這種犬儒與世俗的判斷，忽然看見電視中的自己----剛剛從地鐵捷運站被電視台當作背景拍了進去，一臉茫然神情，目光空洞，「仿佛亂世裡的迷路孤兒」<sup>14</sup>，而那電視的場景，仍不斷地傳來某政黨造勢晚會的站台者強調的什麼時代價值的聲音。小說就在這樣空洞的日常與政治場景的同構下收篇。

<sup>12</sup> 徐譽誠〈與情愛無關〉，收入《97年小說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9年，頁232-233。

<sup>13</sup> 同上註，頁238。

<sup>14</sup> 同上註。



很明顯地，徐譽誠成功地讓女主人公承擔一種焦慮，並透過她無言的焦慮感，將這篇台灣當下的社會問題有機地整合在一起---解嚴後通俗化的選舉與「民主」實踐，顯然並不能有效給人民帶來真正的幸福，而那種簡單地批評暴動的常識與感覺結構，更是助長人民繼續平庸與麻木生活的生產基礎。事實上，在人類追求自由、平等與民主等革命的歷史上，暴動一直是一個與現實依存的視野，在文學史上，列寧也曾以此來批評過托爾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惡的限制<sup>15</sup>，所以，並不是不能批評台灣的社會運動及暴動，而是如何歷史與豐富化的評述這些現象，然而，在新世紀以降的台灣，這樣的視野卻被過於簡單且平庸地擱置。

因此，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儘管想相信人的生命仍應該要有一些時代價值（她聽到這個聲音），但最終仍以空泛的感覺模糊一切（好在整體上仍有一種尖銳的張力）。參照前面劉亮雅の後現代與後殖民的說法，我覺得可以進一步這樣理解---台灣的後現代思潮，為主體帶來意義追求的解構與看似多元的空間，也難以形成一種中心價值或相信任何精神價值，所以無論在情愛或愛欲上可以輕易向外發展。但是，後殖民的思潮，所召喚的卻是另一種本土、國族集體性與某種群體價值的再形成，然而活在現代都會蝸居的相對弱勢的年輕人們而言，這種本土與國族的集體性的強化，跟他們實際在生活中所遭受到的貧乏、窄小的困境與感覺，實有明顯的落差與斷裂---蝸居在都會下層，依附在現代性體制，從事基層、超時且過勞的工商工程服務等工作，是不可能讓主體有能力或狀態，投入什麼國族或本土的視野以獲得安頓的，相對來說，這類具有某種理想主義性質的本土國族力量，對都會底層的青年們的人生，其影響的效果，也難以短期且明顯地發生作用。徐譽誠充份地將這種都會下層年輕人，間接地被兩大「後學」思潮（後現代與後殖民）影響，卻跟他們實際的生活與感覺的斷裂尖銳地再現出來。有鑑於這種類型的主體，在台灣現代都會裡的狀態恐怕占大多數，因此這種尖銳也就更有其進步意義。

#### 四

綜上所述，胡淑雯〈浮血貓〉、黃麗群〈入夢者〉及徐譽誠的〈與情愛無關〉，在開發台灣資本主義現代性下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的視野，有一定左翼意義上的進步性。他們在操作這樣的題材時，都不約而同地發現主人公們

<sup>15</sup> 列寧〈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收入《列寧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42。

的「宅」的傾向，在這裡，「宅」並非家的意義，而與窄小的空間、自我內縮與幻化、封閉與孤獨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然而，在生命出口的追尋上，胡、黃都不約而同地，更多地繼續選擇與相信以個人與封閉式的情感/情欲，作為主人公們的救贖，使得本來可能更具有社會分析性質與效果的主體解放視野，仍然在作家們對左翼思想、美學淵源及典律較薄弱的情況下，明顯地讓作品中的矛盾、尖銳的現實張力相互抵消。反而是在徐譽誠的〈與情愛無關〉的邏輯中，作者以克己的敏感與直覺，終於於意識到---弱者、底層所以難以展開更有意義的情愛/愛欲交流，真正的困境關鍵恰恰是台灣社會都會現代性的「單向度」（馬庫塞語）體制，以及空泛的、維持現況的「民主」、「自由」的形式與意識型態，作品因此最終將女主人公推向孤絕與虛無時，生成一種內在的尖銳張力，預告了日後可能發生新的轉折或契機。

這不禁讓我聯想到以塞亞·伯林(Sir Isaiah Berlin, 1909- 1997)評述馬克思主義與革命的關係時，曾綜合巴枯寧的觀點認為：「只有真正異化了的、走投無路的人才可以實現(筆者按：革命)，他們沒有被利益派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對於他們將要摧毀的世界也沒有什麼留戀之情。……他們一無所獲，因此即使是最極端的動亂，他們也一無所失。」<sup>16</sup>這段話恐怕既揭示了歷史上革命主體起源的真實，也暗示了當中的希望與危機。而今，在一個看起來似乎是持平、穩定卻危機四伏的兩岸現代新時代，我願意將這伯林的這段話，視為一種「作用」的方法，也作為當下文藝工作的思考視野與再辯證的新起點----意即，我認為本文所述評的這幾位作家，在這些作品中所選擇與體現的題材與主體----他們的異化與走投無路，事實上已經暗示了即使在身處或投身更極端的混亂，他們確實最多也不過一無所失，因此，他們可以作為辯證意義上的社會更新與再進步的新興藝術力量。當然我所期待的，仍是魯迅〈在論雷峰塔的倒掉〉中的視野：「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sup>17</sup>。

在二十世紀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實踐挫敗，台灣戰後長期擱置與遮蔽左翼的現代歷史下，新世紀兩岸的作家們，是否能夠繼續在「革新的破壞者」之路上探索前行？我願意相信，他們正在路上。

<sup>16</sup> 以塞亞·伯林原著，潘榮榮，林茂譯《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頁177-178。

<sup>17</sup> 魯迅〈在論雷峰塔的倒掉〉，收入《魯迅全集第一卷：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204